

# 編後語

本期收錄的諸篇論文，儘管各有關注的焦點，但率皆與近代學術的引進，如何在中土實踐過程中所面對的課題息息相關。讀者在分別檢讀之際，或可相參互證。

斯文·赫定（Sven Hedin, 1865-1952）所組織的「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」（The Sino-Swedish Expedition），是近代中外學者首度合作的大規模的學術考察活動，獲得許多重要的考古成果。參加考察團的黃文弼（1893-1966）即於此次考察中發現坐落在羅布淖爾湖北岸的「土垠」遺址。王炳華先生嘗試對勘出土的漢簡與古典文獻，斷定土垠並非一般烽燧的遺跡，而是傳世文獻中兩漢時期自敦煌、玉門通往西域途中位居樞紐的「居廬訾倉」，負有軍事、屯田、倉儲與郵傳等多重功能。值得注意的是：黃文弼參與西北考察團時掘獲之文物，部分雖於戰亂流離之際毀損，所幸仍有部分輾轉收入臺北的故宮博物院，或是寄存於歷史語言研究所而保留至今，其中包括漆杯、石窟壁畫，以及羅布淖爾漢簡等。曾於史語所中原考古庫房工作經年的丁瑞茂先生，特別撰文追索這段歷史因緣。

在「中瑞西北考察團」的十年之後，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主導之下，前後與中央博物院、北京大學等單位合作，展開了另一波重要的西北考察活動。研治中西交通史的名家向達（1900-1966），正是前後兩次考察活動中的靈魂人物。羅丰先生利用傅斯年圖書館收藏的《史語所檔案》，不僅勾勒出向達在此考察活動中的付出與成就，更對考察團組織動員與物資籌措的艱辛，與當時各方學者間協同磨合的困難，一一進行深入的探索。見證了近代中國學界儘管隨著時局顛沛流離，依然試圖在戰亂烽火中摸索挺進。

本期有兩篇論文，則涉及近代中國迎向西方時所遭遇的兩大課題：西學與西教。在西學大量移稼到中國的過程中，學術與政治從未曾清楚切割。鐘月岑先生試圖從「優生學」在西方的興起後的跨國傳播中，回顧其引進中國時的政治文化與社會脈絡，釐清優生學與種族論述間的關係。並反思此一生物科學如何被政治挪用、遭受污名，迄今又捲土重來的曲折發展。

隨著西方學術體系逐步成為檢定一切知識的基準時，中國既有的文化傳統不得不面臨重新定位。黃進興先生從思想史的角度，藉由近代知識社群對儒教與「宗教」間依違離合的相關論述，進行宏觀的分疏考察，實為勾勒儒教近代發展的綱領之作。儘管該文僅以「清末民初」作為時代斷限，然其所關注的課題不啻延續至今，例如文中分析當代新儒家關於「宗教性」的闡述，既寓同情的瞭解，亦直指其問題核心：新儒家學者以為別開生面的義理新詮，恐怕正反映出儒教安頓在現代學術體系時納鑿入柄的現代困境。

最後，在史料輯存方面，楊正顯先生長年蒐羅王陽明散佚詩文，此篇續作再次提醒我們：即便在「故紙堆」中仍潛藏著無數可能的「新材料」，等著學者耐心發掘。

附記：筆者於羈旅海外期間，曾蒙林富士先生協助主持編務，謹此深致謝忱。